

# 《首阳山赋》在阮籍思想转变过程中的意义

赵永娥

西北师范大学

DOI:10.32629/er.v3i2.2501

**[摘要]** 与阮籍的其他作品相比,《首阳山赋》并不著名,但其创作的时间节点和内容都反映了它在阮籍思想转变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它不仅是阮籍从仕态度转变的标志,也是他对儒家思想产生怀疑的一个标志。纵观此赋创作前后阮籍思想上的转变,笔者认为《首阳山赋》在阮籍思想发展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关键词]** 阮籍;《首阳山赋》;思想转变

《首阳山赋》是阮籍正元元年秋后的赋作,在此赋创作前后阮籍的身心经历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元元年是高贵乡公曹髦的第一个年号,也是魏齐王曹芳的最后一个年号,这一年在曹魏政权的衰亡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作为曹魏臣民,阮籍看着司马氏夺取政权的野心一步步暴露,其内心不受触动应是不能的。《首阳山赋》作于这样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其赋中透露出压抑痛苦挣扎的情怀,并一度表现出对他一贯推崇的伯夷叔齐的怀疑,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探究。

## 1 从阮籍的仕途经历看《首阳山赋》的创作契机

阮籍一生的仕途经历有明显的分期,33岁(公元242年)之前阮籍并未出仕,公元242年阮籍首次出来做官,这次做官带有强迫性质。“太尉蒋济闻其有奇才而辟之,籍诣都亭奏记曰‘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据上台之位,英豪翹首,俊贤抗足。开府之日,人人自以为掾属;’…负薪疲病,足力不强,补吏之召,…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济大怒。于是乡亲共喻之,乃就吏。后谢病归。复为尚书郎,少时,又以病免。”<sup>[1]</sup>公元247年,曹爽辅政,欲召籍为参军,因以疾辞。此年,大将军曹爽专擅朝政,多树亲党。公元249年正月初六,司马懿趁当时的皇帝,魏齐王曹芳率领曹爽诸兄弟前往高平陵祭祀魏明帝曹睿时发动高平陵政变,正月初十,司马懿以谋逆反叛之名诛杀曹爽,并夷其三族。同时被夷三族的还有曹爽的近臣:“正月,收曹爽及其弟中领军,武卫将军训,尚书何晏、邓飏、丁谧司隶校尉毕轨,荆州刺史李胜,司农桓范,皆下狱,劾以大逆不道,与黄门张党俱夷三族。”<sup>[2]</sup>高平陵之变以司马氏取得绝对胜利而告终,但朝局不乱,四海皆安,“王凌之子广曰:何平叔虚而不治,丁、毕、桓、邓虽并有宿望,皆专竞于世;加变易朝典,政令数改,所存虽高而事不下接,民习于旧,众莫之从,故虽势倾四海,声震天下,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sup>[3]</sup>此次事变之后曹氏宗室力量薄弱,已无力与司马氏集团抗衡,司马氏得以完全掌握政权,向日后篡权夺位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此年四月阮籍为司马懿的从事中郎,司马懿死后又担任司马师的从事中郎直到254年。这便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同为正始名士的阮籍因何躲过了司马氏诛杀?二是一向避不就官的阮籍缘何做了司马懿府中幕僚了呢?对此笔者有以下几个回答:阮籍没有被杀,其一是因为他名高于世;其二“阮籍名声甚大而与政权并无妨碍,杀了既与当政者无所裨益,且蒙残害名士之恶名”;<sup>[4]</sup>其三阮籍必须承认司马氏集团存在的合法性。这三点可证:以司马氏对名士的高压政策看,若阮籍不承认其存在,阮籍是绝对逃脱不掉被诛杀的命运;阮籍少侍儒学,讲求仕宦,但他在33岁之前虽怀有济世之志,却从未出仕可以证明这一点。同时司马氏集团在当时是得民心的:“司马懿父子累有大功,除其繁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苦,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阮籍性格并不如嵇康那般刚烈,对司马集团虽有怨怼,但并没有做出直接的反抗。他之所以做了司马懿的从事中郎大抵跟他与司

马氏的特殊关系相关,如孙明君先生言“阮籍既不是对司马氏集团深恶痛绝而对曹魏‘忠爱缠绵’的忠臣义士,也不是出卖曹魏而投靠司马氏集团的小人,他与司马氏集团之间的关系是特殊时期政权与名士之间的特殊合作关系。”<sup>[5]</sup>

《首阳山赋》创作前后阮籍对于从政呈现出明显不同的态度,在其创作之前,阮籍仅有两次出仕经历,且两次均为被迫做官。但在此赋创作之后,阮籍对于从政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主动,他积极求官,并在此后长期浸润于庙堂。但阮籍绝对不是一个毫无政见,是非不分的糊涂人。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他对于司马氏的专断残暴和勃勃野心是看在眼里的,之所以与司马氏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与他自身性格的软弱有一定关系,因而他没有公开站在曹氏集团一边而成为他的殉葬者。所以才会在《首阳山赋》的第一段中表现出痛苦挣扎、无所适从且无所依傍的孤独心理。

## 2 从“首阳山”意象来解读阮籍创作《首阳山赋》前后的心灵转关

“首阳山”意象得源于《史记·伯夷叔齐列传》,其中记载:武王伐纣,伯夷兄弟表示反对,批评周武王:“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sup>[6]</sup>后义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对此司马迁赞其“积仁洁行”,孔子赞其是“求仁得仁”。在《首阳山赋》创作之前“首阳山”意象曾多次重复出现在阮籍的作品中,他的《咏怀诗》对“首阳山”意象的引用尤多,且均表现出阮籍对伯夷叔齐二人义不食周粟的高洁品行的称赏。但阮籍在《首阳山》赋中却一反常态,对自己一向推崇的伯夷叔齐产生质疑:

“肆寿夭而弗豫兮,竟毁誉以为度。察前载之是云兮,何美论之足慕。”

作者说到伯夷兄弟置自己的生命而不顾,竟然将世人的赞誉和诋毁当做生命意义的法度。很明显的,阮籍对于伯夷兄弟这种重名而轻生的做法不予苟同,名于他来说已不如命来得珍贵。在后期的阮籍看来,一个人的生命远远比他在俗世的浮名重要。正始以后,魏晋禅代,司马氏集团打着名教的幌子,罗织罪名,诛锄异己,把名教变成了争权夺利的工具,人们被迫在名教与自然之间做出选择。“从深层含义看,这种选择反映了在魏晋禅代这个历史时期,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已经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险恶的政治环境迫使人们或者放弃理想与现实妥协,或者坚持理想与现实抗争…阮籍与嵇康的玄学思想不能不从自然与名教相结合演变为自然与名教相对立。”<sup>[7]</sup>所以阮籍才会一反常态,对伯夷兄弟的行为产生质疑,这是作者对儒家思想的质疑,也是为自己在乱世宦海中浮沉找的说辞。如赋中最后一句所说“苟道求之在细兮,焉子诞而多辞,且清虚以守神,岂慷慨而言之”,如果道所求是微贱无闻,那为何二子要放诞妄谈,姑且清静虚无静守精神,何必情绪激昂而评论述说呢。他在与原来那

个痛苦挣扎的自己达成和解,与儒家的君臣之道和自己最初的济世之志在做告别,他再也不愿标举伯夷叔齐的楷模作用,也不愿再慷慨的去评说世事,笔者认为这一写法可以作为《首阳山赋》在阮籍心灵裂变过程中所起的界碑作用的一种佐证,因为无论阮籍内心是如何的不甘愿,至少在表面上他是倾向于司马氏一边了。他试图回避现实,摆脱政治漩涡,但已是不可能了。

### 3 从阮籍的思想分期看《首阳山赋》的特殊地位

阮籍一生的思想颇为复杂,此处只简略谈一下与《首阳山赋》有关的问题。《晋书·阮籍本传》:“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政治形势的变化为阮籍思想的转变提供了契机。他的志向由原来的济世转而为不与世事,政治上的这种转变映射到思想上,就形成了阮籍思想的分期。阮籍一生的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两次大的转化。他早年崇尚儒家思想,志在用世,后来发生魏晋易代的动乱,深感生命无常,因此采取了蔑弃礼法转到以隐士为志趣的道家思想上来。这是一个粗略的说法,正始前期的阮籍并没有完全突破儒家的思想框架,但有引老入儒的倾向,这一时段他的著作有《乐论》、《通易论》,这是他思想中的第一个时期。正始后期,阮籍引老入儒,崇尚玄学,作《通老论》,这是他思想演变的第二个阶段。正始之后也就是竹林时期,阮籍摒弃礼法,反对儒学,追求个体的自由与逍遥,实现了自己思想上的第二次转化,《达庄论》、《大人先生传》正是这种思想的产物,这一阶段他的创作以赋为主,而赋正是他思想转变的印证。

“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陆机有“赋体物而浏亮”之句,郑玄在注《周礼·春官·大师》中曰:“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由以上所见,赋之文体以铺陈写物为主,而阮籍的赋体文与之有所不同。《首阳山赋》中作者描写了曹芳被废前后自己心中的矛盾痛苦,并对自己一贯敬仰的伯夷兄弟进行了重新审视,这也是作者对自己信仰的再审视,同时也是阮籍独特的赋体创作思维的体现。在他现存的诸多文体中,赋是他用来批判现实的主要武器。阮籍现存的六篇赋的创作时间集中在249年到255年之间,在这一时段,随着曹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的斗争趋向白热化,阮籍的政治态度和生活态度都在经历一个剧烈而痛苦的转化过程,也就在这一时期,许多文人寄情山水,饮酒谈玄。依高晨阳先生言:“正始末年,曹氏和司马氏的斗争已经白热化,曹爽专擅朝政,排斥司马氏,司马氏趁机反攻,终于在正始十年给曹爽党羽以致命打击,在这种形式下,“七贤”中

的主要人物对政治都采取了回避的态度。”<sup>[8]</sup>阮籍虽然在黑暗的社会现实面前选择由儒入道,但儒家思想作为他个人的思想底色,一直没有被阮籍彻底摒弃,在正始中后期,名教被破坏殆尽,成为争权夺利者屠戮士人的工具,如《达庄论》中所说:“竞逐趋利,舛倚横驰,父子不合,君臣乖离”,虽然阮籍对名教进行了批判,但他并未真正放弃名教。阮籍在正元元年,也就是作《首阳山赋》的时候,他对圣者贤臣确实表现出了明确的怀疑,也是在这之后,他一方面在司马氏集团中做个不图政绩的散官,另一方面更加的酣畅不羁,处处表现的超然事外,求生的渴望与背离理想的痛苦相互交织,昏沉颠倒的度完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光。

### 4 结语

结合以上所说,正元元年,齐王曹芳被废,司马氏明目张胆的向篡权夺位迈出关键性的一步,这使阮籍的心灵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震动,他认清了两朝易代之势不可逆转,但是为了保命也为了家族荣辱,他只能在司马氏集团中苟延残喘。正元以后,阮籍无论在仕途上还是在个人行为上都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放达任性,贱名贵生成了他思想的外在表征,由醉心于“自然”与“名教”的结合转而为“自然”与“名教”的对立,但仍保留了自己的最初的思想底色,分裂式的思想精神让他痛苦不堪,郁郁的走完了自己生命的最后十年。《首阳山赋》作为他这一时期存留的作品,可以看作是阮籍向他早期济世志向达成妥协的一个宣言书,在阮籍的思想转变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 [参考文献]

- [1]房玄龄.晋书·阮籍传[M].中华书局,1974:341.
- [2]陈寿撰,卢弼集解.三国志集解 其二[M].中华书局,2009.
- [3]阮籍著,陈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M].中华书局,1987:435.
- [4]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144.
- [5]孙明君.汉魏文学与政治[M].商务印书馆,2003:159-160.
- [6]马持盈注.史记今注[M].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2172.
- [7]余敦康.魏晋玄学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316-317.
- [8]高晨阳.阮籍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153.

### 作者简介:

赵永娥(1994--),女,汉族,甘肃环县人,硕士,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文学。